

做父母、做階級： 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

藍佩嘉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台灣的主流親職論述在西方理念影響下，近二十年來衍生明顯轉變。然而，不同階級位置的父母在近用文化資源時管道有所不均，不僅形塑他們教養方式的差異，也影響孩子在改革中教育體制裡的生命機會。透過對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父母的深度訪談與家庭觀察，本文分析親職敘事與教養實作的階級差異。我贊同先前學者視教養為階級再生產機制的觀點，但反對將階級化約為給定的結構位置，或預設階級慣習的跨代延續。台灣個案凸顯了父母承自原生家庭的慣習可能透過反思而轉變，以及親職作為一個協商階級界線的社會場域。親職日常實作充滿了不確定與矛盾，包括教養腳本與親子互動之間的落差，以及家庭生活與學校期待之間的衝突。我也強調，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父母都不是同質群體，在教養策略與實作上存在內部分歧。透過父母資本總量高低（含經濟、文化、社會與象徵資本），以及追求益品傾向（偏重競爭流動或自然發展）等兩條軸線，我建構出一個「親職場域」來分析做父母、同時也在做階級的劃界過程。

關鍵詞：親職、教養、階級、慣習、教育

Being Parents, Doing Class: Parenting Narratives, Childrearing Practice, and Class Inequality in Taiwan

Pei-Chia L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dominant repertoire of childrearing in Taiwan has greatly transformed under Western influence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Parents of different class backgrounds, however, have uneven access to relevant cultural resources; this not only shapes their varied styles of childrearing but also impacts their children's life chances in the changing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household observations, this paper compares middle-class and working-class parents in terms of their narratives of parenthood, parent-child interactive styles, and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 criticize the literature on childrearing and class reproduction for reducing social class to dichotomous categories determined by economic structure; I also contest the assumption that class habitus continues across generations. The case of Taiwan shows that parents may change the habitus inherited from the family of origin through deliberate reflection and that parenting constitutes a social field of negotiating class boundaries. My research demonstrates ambigu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parenting, including a gap between cultural scripts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and a clash between family life and school expectation. Neither the middle class nor the working class is a homogenous group without internal divides. Based on two coordinates—parents' volumes and composition of capitals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and symbolic capitals) and their orientation toward the pursuit of "goods" (prioritizing competitive mobility or natural development), I map a "field of parenting" to analyze the process of boundary-making, in which parents are "doing class" in everyday family life.

Keywords: childrearing, childhood, social class, habitus, education

台灣在近年來成爲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¹ 背後有許多原因，日益提高的教養花費與父母投入是其中關鍵因素。媒體上出現「養一個小孩要伍佰萬」、「教育投資超過一千萬」等聳動說法，² 教養雜誌與親職書籍在市場火紅暢銷，儘管如何養育小孩這個問題，對不同階級、社區的父母來說答案大不相同。當今的台灣社會，受到全球資本流動與在地經濟停滯的影響，貧富差距擴大，更凸顯童年與親職作爲社會不平等之體現、運作與再製的重要場域。

台灣的親職論述在近二十年來產生明顯的轉變，大致可勾勒出以下三個趨勢：³ 首先，親子關係從孝親傳統規範下的社會交換道德契約，轉爲強調內在於關係本身的親子連帶與情感滿足。其次，父母的角色從管教孩子的執行者，轉變爲科學育兒知識與親職教育的接受者。「愛的教育」(permissive parenting)，這個自 1930 年代以來在美國社會占據主導地位的親職典範(Stearns 2003)，取代權威管教成爲正典的親職模型。體罰不再被認爲是「嚴格父母」的做法，而是不願意接受親職教育的「懶惰父母」。最後，智育至上、填鴨背誦的學習方式已受到教育改革運動的強烈批評。教育專家呼籲教師和家長應該連結學習與樂趣，以多元學習的方式來啟發孩子的創造力，栽培的面向擴大到人格、個性、情緒管理與溝通技巧等。

親職論述作爲「主導文化腳本」(dominant cultural repertoire)，具有規範、典範的地位，讓家長認爲「現代父母應如此」。這些親職論述固然提供了跨國界的文化資源與工具，但也造成當代父母更多的焦慮、壓力與不確定。尤其，父母需有一定的經濟、文化與時間資源，方能在家庭生活中履行新式的教養腳本，而不論是中產階級或勞工階級，多數父母經歷教養腳本與親職實作的斷裂，甚至矛盾。本文探討不同階級位置的台灣父母，在這樣的論述脈絡與時空環境中，如何透

1 台灣的總生育率在 2010 年降爲 0.895，爲全世界最低，引自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www.ris.gov.tw/zh_TW/346 (讀取日期：2014/4/29)。

2 聯合晚報(2006)，商業周刊(2007)。

3 此處根據我們對中國時報家庭版、聯合資料庫與<親子天下>雜誌進行的內容分析，論述細節及資料出處請參考 Lan (2014a)。

過世代比較的框架來描述自己的親職理念、如何透過資本的積累與轉換來安排孩子的教養，以及親職敘事與教養實作如何作為一個協商階級差異與不平等的社會場域。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父母的社會階級如何形塑其親職態度與教養方式，又如何影響子女的成就與發展，長期以來受到社會學者關注。Melvin Kohn (1963)指出職業影響了父母的價值與親職態度：中產階級職業著重個人的自主，勞工階級職業強調對權威的服從。Pierre Bourdieu (1984; Bourdieu & Passeron 1977)則認為，教養方式的階級差異源自於資本、品味、秉性的代間傳遞，也促成了階級關係的再生產。

Annette Lareau (2003)延續上述理論命題觀察美国家庭生活，呈現不同階級的父母在育兒方式上的差異。專業中產階級父母採取「規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方式：透過細心規劃、協作安排各式休閒與學習活動，來培養小孩的才藝與表達能力；父母運用「講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與孩子溝通，並允許小孩反駁成人意見。具備高教學歷及專業背景的父母，較有能力及正當性介入學校運作，不僅經常批評學校政策，也訓練小孩採取類似作法。這樣的教養方式讓孩子養成「權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擅於捍衛自己的權利與利益，有助於將來進入專業白領勞動市場。勞工階級與貧窮家庭的育兒風格則是「讓孩子自然長大」(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小孩主要互動的對象不是成人，而是親戚小孩；父母多直接給指令，不允許孩子挑戰父母權威。由於家長的教育程度與職業位階較低，其社會網絡中也少有教育工作者，他們對於老師與學校心生畏懼或深感疏離，面對體制覺得無力或挫折。這樣的教養方式容易讓孩子養成「侷限感」(sense of constraint)，傾向服從或配合體制，這也是符合體力或服務勞動的身體慣習。

我對 Lareau (2003)的研究有兩個主要批評：首先，她將階級視為

給定的結構位置與二元範疇，⁴並將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看作同質的群體。這樣的分析把階級等同為勞動市場中的位置(positions)，忽略了「階級過程」(class process)的分析(Reay 1998)；雖然生動呈現了兩套階級化的教養腳本，卻未能探討階級間相互區分、劃界(boundary-making)的過程(Lamont 2000)，也無法關照到階級內部不同的親職價值與教養方式(Irwin and Elley 2011)。

其次，Lareau 的研究強調階級慣習(habitus)的代間傳遞，但未直接討論父母的親職風格受到何種機制的影響，比方說，是 Kohn 所說的職業價值，或是 Bourdieu 所認為的階級秉性的世代傳承。相對於法國，美國社會的階級流動管道較為通暢，戰後的教養腳本也有明顯改變(Levey Friedman 2013)；事實上，當代美國中產階級父母在過去也鮮少被用「規劃栽培」的方式撫養長大。該書呈現的教養腳本相對靜態，並未關注教養實作如何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特別是教育制度和規範論述的轉變。像台灣這樣的晚近工業化國家，代間與代內的階級流動快速與頻繁(許嘉猷、黃毅志 2002；蘇國賢 2008)，考量親職態度與教養腳本的轉變尤其重要。

台灣的教養研究，提醒我們注意在地的特殊文化脈絡。歷史學者熊秉真(2000)研究前現代中國的幼教或「訓幼」文獻，發現不同時代的士人家庭教導孩子的重點雖有不同，但普遍帶有功能論色彩：兒童的存在目的是為了「學做人」，也就是養成符合社會規範的成人特質，以光宗耀祖、延續香火。兒童的情感價值(Zelizer 1985)，要到二十世紀後的中國才逐漸受到重視。台灣的祖父母世代普遍使用體罰，如打手心、打屁股、罰跪等方式(吳齊殷、高美英 1997)，親子關係強調地位尊卑，教育手段也顯現出外控、他律的觀點(林文瑛、王震

4 Lareau (2003)根據兩個標準區分階級：一是工作現場的管理權；二是工作上的學歷要求。雙薪家庭中若父母雙方屬於不同階級位置時，以較高者為準。中產階級指家中任一全職工作者在公司裡占有重要的管理權，或者此職位要求較高的教育程度，如大學畢業；勞工階級則指家中無人為中產階級位置，且任一全職工作者在工作場所擁有相對少的管理權，同時此職位並不要求較高的教育程度，此定義也包含低階白領階級的人。

武 1995)。然而，學者也指出，「嚴酷教養」傳統的代間傳承已出現鬆動，罰跪、打耳光的處罰方式變得少見，尤其是高教育程度的父母（吳齊殷、高美英 1997），年輕父母世代的教養價值逐漸朝向「類平輩關係」（林文瑛、王震武 1995）。總結來說，有關教養的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仍多集中於量化研究；教養方式的變與不變，透過怎樣的機制與形式在運作、顯示怎樣的階級差異，仍有待質性資料來深入探討。

階級研究者面臨以下兩難與挑戰：如何強調階級分類的重要，但避免物化階級範疇或複製刻板印象？如何將階級看成一個活出來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並能掌握階級內部的異質、動態的劃界過程？我認為，一方面，我們需要借重 Bourdieu 的理論工具，來動態呈現階級劃界與象徵鬥爭的過程，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超越 Bourdieu，從其他的理論角度，來分析階級的情緒政治、慣習的代間斷裂，以及階級的內部分歧。

Bourdieu 的階級理論幫助我們考察不同階級群體的結構處境與相互關係。首先，資本的多重組成（經濟、文化、社會與象徵資本）與相互轉換，不僅可以解釋中產階級的教養策略與優勢，也可以描述弱勢父母如何在資源有限的結構條件下勉力生存。其次，資本的配置與相互關係形成了社會空間，也就是「場域」(field)的概念。不同的階級群體彼此未必有實質接觸或互動，但他們定位自己時，有意或無意地以其他階級群體作為區辨、排除、模仿、對比的參照點。我在後文中，仍以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等範疇作為初步分類，但以光譜的方式來看待教養策略的差異分布，並透過分析不同資本的轉換來呈現動態的協商過程。我也將親職看成一個階級化的場域，用社會空間的分析工具來呈現階級群體間的相互關係。

階級之間的劃界，不僅涉及資源的競逐，也形成攸關道德正當性的象徵鬥爭。Beverley Skeggs (1997)在分析英國勞工階級女性的經典著作中，指出 Bourdieu 的理論較擅於分析優勢階級如何透過象徵支配再製其優勢，相對起來，較少分析弱勢階級如何經歷弱勢一被排除、

邊緣化。她強調階級分類作為一種政治化的論述框架，再製了勞工階級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或「階級的情緒政治」(emotional politics of class)，讓他們容易自我懷疑，感到困窘、焦慮、怨恨，擔心自己永遠沒辦法「做對」(get it right) (p. 6, 90)。Skeggs指出，中產階級母親也經常自責不適任，不同處在於她們仍被看作教養論述中的常態(normalcy)，不像勞工階級被視為不適任且污名化。台灣的新興教養論述往往預設了中產階級家庭、專職母親作為典型，⁵本文試圖關照教養論述中隱含的階級偏誤，衍生怎樣的情緒政治，又如何影響弱勢父母的教養實作。

Margaret Archer (2007)批評 Bourdieu 的結構主義導向，假定了客觀位置與主觀稟性的一致、同形(homology)。Archer 認為個人的反思與能動性中介了兩者之間的因果力量，因而造成社會位置相近者可能有不同的行動傾向。⁶受到 Archer 的啟發，我將親職視為反思(reflexivity)的實作，特別當面臨「結構、文化與生命經驗的不連續」時(Archer 2007: 47)，人們傾向將自己的生命經驗當作對象來反省、進行「內在對話」(internal conversation)。不同於「慣習」的概念植基於重複的情境與持續的關係，「反思」容易發生在人們面對不熟悉或有問題的情境之際。承此，本研究特別關注台灣父母在面對外部環境（如教育體制、勞動市場）的不確定，以及主流教養論述的變化時，如何透過反思自己的童年及父母的教養方式，來評定理想的教養腳本或親職價值，並逐步修正自己的慣習。

Andrew Sayer (2008)也批評 Bourdieu 把社會行動化約為利益競逐或資本積累，沒有留下太多空間討論道德評價。他用「益品」(goods)的概念來指稱人們欲求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符應資本積累邏輯的「外部益品」，如父母希望孩子取得教育成就，有利未來的競爭或流

5 本文限於篇幅無法分析教養論述本身，僅透過父母的感知經驗來考察這些論述的效應。

6 相近階級位置的家長，當然會因為個人生命史或個性特質等因素，衍生教養方式的差異。本文僅指認具有社會學意義的群體傾向，也就是在一定結構條件（階級位置與資本組合）的允許或限制下，行動者如何發揮能動性來反思、並且與既有慣習斷裂。

動，但也存在道德價值定義下的「內部益品」，如父母希望孩子擁有快樂的童年，或相信孩子應該自然發展。我認為，益品的概念，尤其是內外益品的區分，可以幫助我們分析父母的不同親職價值與欲求標的，而不全然化約為資本或利益的追求。雖然，如何界定什麼構成「教養益品」的構成、誰有能力與資源來界定，也是階級間象徵鬥爭的一部分。⁷

總結以上，我將親職經驗區分為三個層次，這些層次的內容經常不一致、斷裂，甚至矛盾：「親職敘事」指的是父母透過敘事性理解 (narrative understanding)，來解釋他們過去的生命經驗如何影響了現在的教養方式；「教養腳本」指的是父母所認同的有關教養的文化規範，也就是他們認為適切、理想的教養方式；「教養實作」則指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做法、教養行為與策略。本文透過「做階級」(doing class)的標題來強調，階級不只是結構上的客觀位置，也在日常生活中透過持續展演、相互區分來達成階級差異與階序的再生產。⁸我從下面兩個相互構成的面向來探討親職作為一個階級化的經驗：

一、階級作為物質位置：父母的資本配置，包括經濟、文化、社會、象徵資本的不同組成、總量與相互轉換，如何影響其教養資源，進而形塑對於不同的親職敘事、教養腳本的偏好？父母教養子女的方式承自父母輩的階級慣習的延續，或透過反思來與前一代斷裂？代間斷裂或延續的傾向與父母的教育背景或職場秉性有怎樣的關聯？

二、階級作為劃界過程：對於不同階級的父母來說，教養腳本與日常實作之間存在怎樣的矛盾與衝突？他們如何在教養實作的過程中協商階級界線：定位我群實作的合理性，以及指認與他群的不同？他

7 Sayer 在書中雖強調道德評價獨立於階級以外，也提到這些評價仍與階級有關，是對階級的回應（頁 10），階級鬥爭同時在爭取評價什麼是雅的 (the posh)、善的 (the good)。

8 「做階級」的標題，沿自女性主義者對於「做性別」(doing gender) (West and Zimmerman 1987)、「做差異」(doing difference) (West and Fenstermaker 1995) 的概念，強調性別或階級不只是外在於個人的結構約制力量，而是透過個人的日常生活實作來達成、實現，顯示結構與施為 (agency) 的相互辯證。但本文並非從俗民方法論或符號互動論立場來討論階級展演。此外，我們也要注意「做階級」方式的階級差異：中產階級傾向對教養實作進行反思，階級劃界往往較為明顯或有意識，勞動階級父母則通常沒有一套系統化的教養腳本，階級間的比較也比較片斷或零碎。

們傾向認為教養首重追求的益品為何，如何得以（或不能）運用象徵資本來正當化自己採用的教養方式？階級如何與性別交織，也就是透過性別化的分工，來落實階級化的教養策略？⁹

二、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文是較大的專書計畫的一部分，在 2009-2011、2012-2013 等三年期間我們透過多重方式蒐集質性資料。首先，我們擇定台灣北部地區的四所公立小學進行田野觀察，分別代表都會區中產階級（位於台北市中心，化名天龍國小）、都會區勞工階級（位於新北市某舊社區，化名河岸國小）、非都會區勞工階級（位於宜蘭縣某漁村，化名海濱國小），以及非都會區另類學校的中產階級（位於宜蘭縣，化名田園國小）。我們在每所學校進行一學期的觀察：每週有一到兩天，由助理進入一所二年級班級（由學校指定），觀察上課情形、下課活動，我則參與班親會、運動會、校外教學等活動，觀察親師互動與家長參與。

我們在學校與家長結識後，開始第二階段的資料蒐集，主要由我（少數由助理執行）進行家長的深度訪談。最理想的狀況是父母分別受訪，若祖父母為主要照顧者，也加入受訪對象；某些家庭只有父母一方有時間或意願受訪。我們共完成來自 46 個家庭中 67 位父母（母 42、父 25）及 6 位分擔照顧的祖父母（祖母 5、祖父 1）的深入訪談。訪談地點多在受訪者家中，也有少數配合當事人意願約在外面（中產階級多約在咖啡廳，勞工階級多約在公園）。訪談均有錄音並逐字整理，以便進行過錄分析(coding)。第三階段的資料蒐集則是親子互動的田野觀察。我們從訪談對象中擇定十二個家庭，由助理觀察家庭生活，每個家戶有至少兩個周間晚上、兩個週末半天的觀察時間。

9 本文以階級為分析軸線，故多以「父母」為統稱，但也會注意到雙親內部的性別分工、母職與父職的重要差異。

我們選擇小二生家庭為研究對象，主要因為該年級的課業壓力較輕、上課時間較短，比較適合觀察課後活動的安排，而且父母已經熟悉了學校和老師。必須注意的是，教養方式通常會隨著孩子年齡而轉變，在高年級與國中後可能縮小課外活動的階層差異；隨著課業壓力的增加，父母往往更重視智育，補習活動也占據孩子生活的更多時間。本研究對於學校、家長的抽樣，盡可能涵蓋若干變異，但無法像大規模的量化研究，抽取具有經驗代表性的樣本。質性研究的抽樣原則在於理論意義(theoretical significance)，以呈現社會趨勢的變化或行動意義的深描。比方說，田園國小的家長固然不是台灣中產家長的常態或平均數，然而，另類教育在近年來的成長擴張，反映了中產階級對於新式教養腳本的渴望，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表一摘要說明從這四間學校選取的受訪家長在性別、家戶型態、教育程度上的分佈。受訪父母的年齡多介於三十到五十歲間（小二生在家中的排行高低不等），勞工階級母親（尤其是新移民）低於四十歲者較常見，中產階級父母相對晚婚，受訪時年齡高於四十歲者較多。在我們研究的兩間勞工階級學校，都有許多來自越南、泰國、印尼或中國的新移民母親：河岸國小學生有 14%來自跨國通婚家庭，海濱國小的比例更高達 20%。基此，受訪個案中也選取了一定的新移民母親。

在階級位置的界定上，我承繼先前的研究者，將（父母其中至少一人）具有大學（含大專）學歷作為中產階級的指標之一，因為高等教育是進入專業白領勞動市場的重要門檻，尤其大多數受訪者的求學歷程發生在高教體系擴張之前。¹⁰此外，我們採取以下職業指標來界定階級：中產階級指的是具有一定工作指揮權或專業技能的白領，包括管理人員、專業人員、助理專業人員，勞工階級則包括事務性工作

10 本研究的中產階級受訪者出生於 1960 到 1979 年之間。高等教育的粗入學率（the gross enrollment rate, GER）在 1976 年僅 15.4%、1985 年為 20.8%，逐步攀升到 1995 年的 39.4%、2000 年的 56.1%，2010 年則高達 83.8%。引自教育部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3973&Page=20272&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讀取日期：5/20/2014）。

表一 受訪個案數量與特性分佈

學校	天龍	田園	河岸	海濱
受訪戶數	13	15	11	7
受訪人數	18	26	16	13
受訪者性別與世代	媽 11 爸 6 祖父 1	媽 15 爸 11	媽 11 爸 3 祖母 2	媽 5 爸 5 祖母 3
父母婚姻狀態	雙親 12 單親 1	雙親 15	雙親 9 單親 2	雙親 3 單親 4
祖父母居住安排	同住 5 鄰居 3 核心家庭 5	鄰居 1 核心家庭 14	同住 5 鄰居 3 核心家庭 3	同住 7 核心家庭 0
新移民母親	中國 1	無	中國 1 泰國 1	中國 1 越南 1 柬埔寨 1
大學/專及以上*	父 10 母 10	父 13 母 12	父 2 母 2	無
高中職*	父 3 母 3	父 1 母 2	父 6 母 6	父 3 母 1
國中*	無	父 1 母 1	父 3 母 3	父 2 母 2
小學*	無	無	無	父 1 母 3 不詳 2**

* 教育程度的統計，包含該戶中未受訪或已離婚的父母成員，不含祖父母。

**該家庭父親入獄、母親離婚，擔任主要照顧者的阿嬤是繼弦，不確知父母的教育程度。

人員和類似技術層級者及非技術體力工。¹¹ 雙薪家庭中若父母雙方屬於不同階級位置時，以較高者為準。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公立學校並不像美國的社區與學校存在明顯的階級區隔。以天龍國小與河岸國小所在社區來說，兩地的房地產平均價格目前有將近一倍的差距，但由於社區內新舊住宅雜陳，加上有寄戶口越區就讀的現象，這兩所學校的家長內部仍存在若干的階級異質性。我們在選取個案時主要以該校的階級多數家長為目標，但也會選取階級少數的家長作為比較。天龍國小與田園國小的家長多為大學或大專學歷以上，職業以白領專業或管理階層為多；河岸國小與海濱國小的家長則多為高中或以下學歷，職業以服務業勞工、藍領勞

11 根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五次的《台灣地區職位標準分類表》，將社經地位分成管理人員、專業人員、助理專業人員、事務性工作人員及其他類似技術層級者與非技術工。

工、自營小生意者為多。

如何研究家庭這個私密的場域，對質性研究者是個挑戰。在深入訪談中，當事人的敘事可能與經驗有所落差，並容易受到理想化的再現（呈現想要被看到的經驗），能言善道、熟悉主流價值的中產階級受訪者尤其如此。至於不擅言辭的勞工階級則可能較無防備地在研究者面前呈現了親子或配偶間的衝突。我對此有所省思，試圖透過多重資料來源（如家庭生活觀察、孩子話語）來呈現較立體的樣貌。此外，我的家庭出身與職業位置都與中產階級有較高的親近性，勞工階級受訪者面對我這位學校老師，可能傾向避免展現對中產階級價值的質疑。我盡可能地反省自己在觀察與詮釋上的可能偏誤，包括與不同家庭背景的助理或同儕討論。受限於期刊論文的篇幅，本文無法深描個案的脈絡與民族誌細節，待未來用專書的方式再行深論。

三、中產階級家庭

（一）親職敘事與教養腳本

當我詢問中產階級父母，他們的教養模式是否受到自己父母所影響時，多數人肯定地說沒有，並加上這樣的說明：「我跟我老婆只有一個想法，不要延續前面一輩的東西」、「我不要成為我媽那樣的媽」、「我父母對我的影響就是，我不想要變成他們那樣」。他們強調長輩意見的參考價值有限，教養書籍、甚至是小孩本身，反而是重要的資訊來源：「我不會問長輩耶。我會自己去想耶，我會比較用自己判斷，看我的書啊……長輩那個方式不見得適合。因為他可能年代跟我們有點距離，其實我大部分還是會先問問小孩」。

中產階級父母傾向使用「世代斷裂」的時間敘事，描述自己的養育方式有別於當年父母的權威形象或打罵教育。但他們也承認在無意識的層次，其實有許多原生家庭慣習的延續與體現。如受訪者說：「過去父母的那一套不知不覺就上身了」、「我就像是我媽的鏡子，怎麼跟她年輕時候一模一樣」。一位母親描述，這些「不自覺的影

響」，透過閱讀教養書籍以及參加家長課程，成為思考與反省的對象，讓她得以「覺醒」（「對我來說也都有自覺了」）。Anthony Giddens (1984)所說的「反思性監控」(reflexive monitoring)，可以用來描述中產階級親職的特色：專家知識的介入，提醒父母必須透過反思與內在對話，將承繼於原生家庭的無意識、自然化的慣習加以「去自然化」，並在日常親子互動中時時檢視、監控，以避免重複錯誤、對孩子造成傷害，逐步改造自己成為「更好的父母」。明明，一位大學畢業、從事保險業的母親（原生父母過去從事小吃生意），這樣描述：

有一天啊，我不知道在對××（兒子名）做什麼時候我就突然覺得，哇，根本就是我媽的翻版，然後我就自己突然有一點嚇了一跳，我就覺得其實我沒有要我自己成為那樣嚴厲的母親，對啊，所以……我其實還滿會自己（停頓）……會自省的一個媽媽啦，就是我對於孩子的一些做法，我會常常去思考說，那如果有這樣狀況我下次...怎麼做會更好，然後怎麼樣去避開我媽媽曾經對我們的方式這樣子。〔訪者：所以妳意思是說妳會有意識的……不要去重複妳媽媽的方式？〕
 呃，常常有意識的時候是已經做下去了（笑），就是只好提醒說，啊，下次知道不要再這樣。

中產階級父母強調反思改變、世代斷裂的能動性；父母輩的養育方式被視為「過時傳統」，難以適用於「現代小孩」。¹² 相對而言，專業職場經驗所累積的文化資本、專業技能或階級秉性，反而容易轉化為教養上的文化資源，幫助中產階級父母進行更有效或良好的親子

12 這樣的跨代斷裂，既反映階級位置的代間流動，也呈現不同世代中產階級的觀念差異。由於台灣作為後進工業國，絕大多數中產階級受訪者的原生家庭，不論經濟資本高低（有不少父母是白手起家的中小企業主），父母多沒有接受高等教育。其中僅有少數個案的父親為大學畢業、有個家庭特別「洋派」，該世代的教養方式並未呈現明顯的階級差異。

溝通。例如，一位擔任房地產仲介主管的父親，在公司接受有關心理學與溝通技巧的培訓課程，這樣的知識不僅幫助他與下屬或客戶互動，也可用來與女兒溝通。另一位在高科技產業擔任工程師的父親，面對女兒不喜歡喝水的問題，並非用強制方式要求，而是把它當作一個 WBS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的 project plan (計劃書)，經父女一起討論後，繪製出一張 SOP (標準流程圖)。父親描述這樣的做法「其實跟我們工作上面是一模一樣的事情」，希望透過這樣的親子討論與實驗，讓女兒「能夠透過一起做分析，來 internalize (內化)」喝水的習慣。這樣的互動模式幫助父母傳遞給下一代若干身體化的慣習，有助於促進孩子的認知與組織能力，以及未來進入專業白領勞動市場的機會。

中產階級父母也透過「跨國聯結」的空間敘事，來展現對專家知識或跨國社群的認同。許多父母在受訪中引用書籍、雜誌或網路文章的觀點來說明他們受到教養專家、或知名部落客的啟發。這些書籍多是英文翻譯過來的國外教養書籍，或由具備跨國經驗的文化中介者所撰寫，如轉介國外書籍或制度的台灣教養專家，或是書寫旅居國外經驗的台灣作家或部落客。¹³ 有不少受訪者提到他們先前在西方求學、工作、旅遊的經驗，如何讓他們視野大開、影響日後為人父母之道。他們嚮往西方親職典範，不僅藉此與傳統育兒模式斷裂，更得以彰顯自己與缺乏國際經驗、視野的父母的差異。

此外，台灣中產階級普遍使用「失落童年」的自我敘事，來說明現在致力維護孩子「純真童年」的前因後果。被主流社會歸為「勝利組」的中產階級父母，成長過程多浸淫在嚴酷的升學競爭與課業壓力中，因而感嘆自己「沒有童年」；由於休閒生活與課外活動受到智育學科的擠壓，導致成人後「我也不知道我本身到底有什麼樣的嗜好、

13 我們分析博客來網路書店 2006-2011 年的銷售統計，這五年間有關親職主題的 92 本暢銷書中，有三分之一翻譯自英語或日語，有 24 本書是醫師、教師、科學家和教授撰寫的專家教養意見，另有 11 本書或介紹國外的教育觀點和系統，或是旅居海外台灣人所撰寫的育兒經驗。

到底喜歡什麼東西」。成長於經濟條件有限家庭的受訪者，少時欽羨家境好的同學有機會學才藝，感嘆「過去家裡沒有條件」，現在有財力可以培育孩子，希望提供更全面的學習經驗。有不少受訪者在童年階段經歷權威或疏離的親子關係，父母忙於生意或工作，沒有時間照顧或陪伴孩子，或受到文化框架的拘束，鮮有情感交流或親密接觸。尤其是男性受訪者多有被父親「打得很慘」的經歷，長大後「希望自己不要成為這樣的爸爸」。

相對於自身的失落童年，中產階級父母傾向抱持「純真童年」的正典觀點，認為父母有責任為孩子實現一個無憂無慮、開心快樂的「理想童年」。父母也清楚體認到，純真童年只是進入充滿壓力的青少年之前的一個短暫階段；在高等教育被視為基本成就的父母期待下，中產階級孩子未來必須面對激烈競爭，以邁入險峻的成人世界。這樣的觀點將成年與童年建構為時間上斷裂的兩個範疇，而非人生現實中連續的生命階段，換言之，「純真童年」是人為隔離、建構出來的狀態。父母需要投入「畫界工作」來維持兩者的區隔，例如，父母試圖保護兒童免於接觸到成人世界與性或暴力有關的訊息與影像，以及避免讓小孩暴露於現實世界的經濟壓力。

上述的親職敘事與童年建構，導引家長採取特定的教養腳本與親子互動模式。首先，中產階級父母雖然在認知上將成年和童年區隔為斷裂的生命階段，在家庭空間裡，兒童卻多與成人密集互動。這種現象在獨生子女的家庭裡尤為普遍，由於沒有兄弟姐妹陪伴遊戲，小孩以父母為主要互動對象。父母基於照顧孩子的實際需要，以及維護純真童年的親職意圖，努力安排以孩子為中心的親子活動，如共讀繪本、親子遊戲。許多時候父母跨越（成人與兒童的）界線來參與純真童年的打造，尤其是利用歐美或日本的卡通人物或神話傳說。許多非基督徒家庭都有慶祝聖誕節，讓孩子相信聖誕老人遠從北極送來禮物，有的父母甚至在家裡佈置的聖誕樹周遭偽造聖誕老人造訪的足跡。有位父親在派駐中國工作時，打電話回台灣給小孩，會假裝自己是「鹹蛋超人」，四歲兒子最愛的日本卡通人物。

其次，傳統華人文化規範下的親子關係，並不重視言語或肢體的情感表達；然而，年輕一輩的台灣父母，尤其是母親，也有部分父親，刻意使用語言（「爸爸媽媽很愛妳」）或肢體（擁抱、親吻）來向孩子展現情感。¹⁴ 這樣的語言與肢體並非來自上一代父母傳承下來的階級慣習，而是刻意學習的「現代」教養腳本。有的父母用中文對孩子說「我愛你」，更多人坦承用英文講「I love you」比較「自然」，顯示這樣的符號互動模式與在地文化的距離，以及相對於西方文化的親近性。

最後，中產階級父母普遍相信應該使用說道理和協商的方式跟小孩溝通，體罰被認為是過時、偷懶或政治不正確的做法。¹⁵ 大多數家庭都有清楚的賞罰規則，鼓勵孩子針對規則來談判或協商，父母期許藉此達到孩子自律的效果，而非強迫遵守的外加規定。父母通常以剝奪孩子的活動權限為懲罰，例如看電視、玩電腦遊戲、踢足球。身體語言的使用也展現對親子平權的重視：我們觀察到，當父母跟年紀比較小的孩子說話時，通常會俯身或蹲下到適合孩子的高度。

父母要履行上述教養腳本，需要一定的前提，包括能力、時間與大環境的配合，否則便會衍生腳本內部的矛盾、不一致，或是規範與實作的落差、斷裂。最明顯的是，上述文化腳本要求父母花費相當時間與孩子溝通相處，然而，台灣的職場文化對家庭並不友善，奉行責任制的專業職場經常要求超時工作，安親班與才藝班成為忙碌父母外包照顧的常見安排。稚齡孩子也深刻感受到現實世界的時間短缺。例如，聖誕節前夕，天龍國小的老師要求學生寫下他們的聖誕節願望。許多願望很常見，例如「我想要長高」、「我想要好成績」，讓我驚訝的是，不少孩子寫著：「我希望爸媽不要工作太晚」、「我希望爸爸可以回家吃晚餐」、「我希望爸爸可以常常回台灣（指父親在中國

14 在華人社會裡，用口語表達情感，尤其針對非親密伴侶，並非異性戀男性普遍養成的性別慣習(gender habitus)。

15 中產階級父母在訪談中傾向用符合主流教養腳本的方式再現自己，例如描述家裡少使用體罰的方式，但在一旁的孩子經常會爆料說：「爸爸有打我」、「媽媽打我屁股」，顯示體罰仍常使用，但孩子的輕鬆反應也呈現相對平等的親子關係。

工作)」。

中產階級父母雖然想要跟孩子說理、給孩子選擇，但面對孩子的不聽話或不配合，他們在職場家庭兩頭燒的忙碌生活中容易失去耐心，對自己的情緒管理失靈深感挫折，或自我指責無法扮演「好父母」（尤其是「好媽媽」）的角色。父母也對採行西方教養理念感到不確定，擔心與孩子將來要面對的現實環境未必相容：首先，教改雖然放寬了進入高中、大學的門檻，但要擠進明星高中、頂尖大學的學業競爭依舊激烈。再者，台灣的職場文化仍然強調服從群體與階層關係，充滿主見、質疑權威的申請者未必受到雇主的肯定。

遵循上述教養腳本的父母容易遭遇我稱之為「親職的文化矛盾」的狀況。中產階級親職，特別是母職，已成為前所未有、要求大量腦力與情感涉入的密集勞動(Hays 1996)；同時，「直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又被批評過度保護，製造出嬌寵、依賴的「媽寶」。為人父母必須踮著腳尖，小心翼翼地維持艱難的平衡：父母有責任在關鍵的成長期，為孩子提供豐盛多樣的啟發，但又必須避免加諸過多負擔與介入、傷害脆弱的幼小身心。身處這樣的矛盾論述脈絡，父母所崇尚的價值觀念與履行的教養實作經常走向「弔詭的分叉路」(paradoxical pathways) (Weininger and Lareau 2009)，換言之，父母的教養實作往往產生非意圖的後果，與其信仰的理念相悖。在後教改的時空環境裡，當代台灣中產階級父母的教養策略存在光譜的差異，以不同的方式來與教育體制協商。以下描述光譜兩端的理念型，絕大多數的家長位於光譜中間，在兩端的力量間拉扯、游移。

（二）教養策略與實作之一：培養國際競爭力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是坊間常聽到的說法。對於光譜右端的家長來說，當今的跑道已不限於國內競爭；媒體甚至用「全球軍備競賽」的戰爭比喻來強調父母從全球尺度來規劃「教育投資」的重要與急迫性（商業周刊 2007）。「培養國際競爭力」，對於送孩子念私校國際班、計劃申請國外大學的中上階級家長來說，是一種具體的

教育策略與人生規劃；對於財力較有限的中產父母來說，則是一種渴望(aspiration)，想像下一代未來出國留學或工作，可以走向更寬廣的世界、面對更全球化的競爭。台灣近年來的經濟衰退也增強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讓家長對下一代的未來更為焦慮。跨國界的資本與人才流動日益頻繁，強化了膜拜全球市場的新自由主義論述，以及對世界人主體位置的渴望與想像。不論「培養國際競爭力」作為具體策略或想像期望，這些父母傾向將教育重點從單一課業表現擴充到「全人教育」的模式，或者，用石易平的話來說，朝向強調多元學習的「雜食教養」(omnivore cultivation) (Shih 2010)。¹⁶

中產階級家長在訪談中多認為每個孩子都有獨特天賦，只要父母可以辨識出來，並給予適當栽培，換言之，孩子的才能被認為可以透過後天培養出來。除了智育學習的課後輔導，如英文、數學，孩子還參加許多才藝班，常見的如鋼琴、小提琴、繪畫、舞蹈（肢體律動）、圍棋、游泳等，也有樂高、桌遊、全腦開發等新興課程。商業資本的投入加劇了童年的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與商業化。各項課外活動最好能轉換為學習憑證、能力檢定或競賽成果，以成為制度性的文化資本。例如，孩子學騎單車可以報名參加營隊，結業後會取得證書；原本親子之間的教騎互動，轉變為講究「有效學習」、「正確技巧」的商業外包活動。許多家庭會把類似的憑證與學習記錄收成一個資料夾，這樣的履歷在孩子未來申請學校時或許可以成為「多元學習」、「全人發展」的客觀紀錄。¹⁷

雖然居住在空間侷促的都會區，中產階級父母傾向有意識地擴展

16 許多量化研究確認孩童才藝學習與父母社經地位的相關，如李鴻章、杜宜展(2009)經由全國抽樣的問卷調查發現，父親職業聲望與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學齡前兒童參與才藝補習的比例越高；李秀如、王德睦(2007)使用「中華民國臺閩地區兒童生活狀況調查」資料，也發現父母教育程度及家庭支出越高者，兒童學習英語越普遍。不過，林碧芳(2009)分析「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資料有不同發現：雖然家庭月收入15-20萬的家庭，其子女學習才藝的機率最高，但家長教育程度與父親職業並沒有顯著影響孩童學習才藝。

17 〈商業周刊〉描述父母從孩子三歲開始透過競賽、檢定等「攻略」開始「集點」，以打造一本「黃金履歷」，補足孩子「教室外的成績單」，有利未來大學甄試的加分（黃亞琪 2013）。

孩子的活動空間。週末除了拜訪祖父母、孩子才藝班外，許多父母，尤其是全職母親，會帶孩子去博物館、圖書館、公園，或者全家開車到郊外讓小孩接觸自然。有的父母坦承說，若不是爲了小孩，他們寧可待在家裡看電視、睡覺，或去百貨公司吹冷氣、逛街。父母也需提早規劃孩子寒暑假要參加的課程或營隊，常見的如游泳課、科學營、昆蟲營、英文營等。爲了培養孩子的「國際觀」或積累「西方文化資本」(Shih 2010)，許多家庭會利用較長的假期帶小孩出國，或是送孩子出國參加夏令營、遊學團（母親陪同或寄宿台灣人家家庭）。如果家庭的經濟資源不足以負擔孩子去歐美澳遊學，新加坡、菲律賓成爲替代性的地點，或者，在台灣舉辦的全美語營隊，提供花費更低的「國際體驗」。

在這樣的家庭生活中，理性化與時間管理成爲明顯特點。負責接送的大人必須在繁忙行程中協調多項活動，有的甚至設定時間表。在我們觀察的一個家戶中，由於擔任管理職的爸爸工作時間很長，每天晚上快十點才會到家，全職家管的母親負責規劃獨生女小芸晚餐後的活動時間表，例如：寫功課 30 分鐘、拉小提琴 20 分鐘、玩電腦 50 分鐘（如果成績退步，縮短爲 35 分鐘）。母親並借用機器來輔助時間管理，如電腦設定五十分鐘後會自動關掉，或要求小芸玩電腦時戴著可以設定時間的護眼裝置（時間到會嗶嗶叫），也用手机設定不同的鈴聲，來提醒小芸起床、爸爸起床（較晚），以及小芸晚上該去洗澡的時間。

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孩因此內化一種結構化的時間感。過多、爆滿的外包學習與課外活動，可能讓孩子疲於奔命，反而減少親子共處的時間。我們在學校便經常聽到稚齡孩子出現這樣的相互對話：「我真的好忙喔！」、「我快累死了」、「我都沒有時間」、「趕快，我要來不及（去上安親班或才藝班）了！」。然而，相對其他學校的孩子，我們最常聽到天龍國小的孩子說：「我好無聊」，因爲他們習慣於成人安排的多樣組織性活動。小芸在家裡常常做完母親規定的一件事後，問說：「那等一下要幹嘛呢？」

中產階級家庭雖然在教養價值上重視孩子的自主與自治，但父母過多的規劃與介入，往往造成孩子依賴父母規劃、「不會自己玩」的非預期後果(Lareau 2003)。小米的爸爸在竹科工作，平日和住在台北的老婆和女兒分隔兩地，工忙之餘就是上網搜尋各式旅遊景點或名勝餐廳，最好能夠「要運動、騎腳踏車、吸芬多精，要看海、對眼睛好，然後要吃好吃」，以安排一個「對孩子身心有益」的充實週末。他自承：「我一個人不會想要去爬山，累得要死，也不會喜歡去曬太陽，芬多精是給小孩吸的」。但爸爸也對這樣的規劃感到有些遲疑與兩難：

不過我……我也不曉得這樣到底好不好啦。譬如說他們自己不會玩，就一定要問「爸爸要去哪裡玩」，這樣好像也……也怪怪的，所以我們常常在矛盾中。他們一睜開眼睛他就跟你說：「爸爸今天要去哪裡玩？帶我出去玩！」讓我覺得就是要……要有那種 plan 這樣。

在許多家庭裡，課外活動的安排並非依據小孩的喜好，尤其是英文課、鋼琴課等娛樂效果有限的課外活動，往往是父母的強制安排。這樣的「規劃栽培」未必會讓孩子衍生一種 Lareau 所說的「權利感」，反而強化了孩子對父母的順從、對權威的尊敬(Shih 2010: 201)，如此狀況隨著孩子進入中學、面對增強的課業壓力時尤為明顯。中產階級父母雖然嚮往與前一代的教養價值進行斷裂，但在入學競爭沒有明顯降低的情況下，許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尊卑」、「嚴教」、「磨練」等傳統教養腳本(林文瑛、王震武 1995)。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青少年，往往感受到較強的父母期望與心理壓力，甚至可能形成憂鬱等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Yi et al. 2009, 范綱華 2012)。

父母在規劃孩子的課外學習時通常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石易平與伊慶春(Shih and Yi 2013)分析量化資料發現，父親職業對孩子的課外

活動參與有重要影響，但母親職業的影響並不顯著；這是因為男高女低的婚姻坡度文化下，多數家庭以父親為主要所得提供者，其職業位置高低影響投入課外活動的經濟資源多寡。該研究也發現，母親的文化資本（以教育程度以及文化活動的參與為測量指標），對於孩子的課外活動有顯著影響，顯示母親扮演著實際規劃與輔助學習的角色。

在我們的研究中，確實有一些中產階級父親積極地投入孩子的教養與學習。相對於勞工階級父親，中產階級工作具有較大的時間彈性（如休假較多或非固定工時），有助打破傳統的性別照顧分工（楊巧玲、徐詔均 2010）。弔詭的是，為了負擔中產階級孩子的高額教育花費，尤其是準備出國遊學、甚至留學的經費，許多父親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與時間來扮演「養家」的父職角色，包括較為高薪的派駐海外工作。換言之，為了提供足以培育孩子全球競爭力的經濟資本，反而導致「陪伴」的父職角色的時間擠壓，甚至空間分離。家庭生活的時間與空間界線都受到職場的入侵：不僅跨國資本流動迫使父親離家工作，勞動的彈性化與電子科技（網路、手機）等媒介也導致工作時間的無形延長。

在多數家庭裡，母親仍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與教養者。在薪資低迷、房價飆漲的台北市，單薪難以負擔日益增加的家庭開支，母親傾向選擇工時較固定或彈性的工作。¹⁸ 母親主要透過自身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積累來輔助孩子的培育，不僅擔任吸取新知與改變實作的啟動者（她們看書、上課，睡前摘錄重點給爸爸聽），也透過與其他母親建立人脈（透過當學校志工、家長臉書社團、Babyhome 等母親網誌，甚至公園溜小孩時認識）來收集相關資訊、統籌規劃孩子活動，以及在孩子學習過程中扮演協助與督促的角色。矛盾之處在於，許多學校活動的參與，甚至才藝學習的陪伴（有鋼琴班或英文班要求家長每次要陪同一起上課），都預設了一個時間充裕而彈性的專職母親角色；這樣的親職期待，對於職業婦女來說倍感壓力，並容易衍生「不

18 例如，有位母親原是工程師，就因為工時太長難以兼顧家庭而改任研究助理。

適任母親」的自責。事實上，除了全職家管母親，兒童照顧外包其實是台灣家庭生活的常態，不論透過商業機構或延展家庭成員。安親班提供親職代理的廣泛服務，包括到校接送小孩、監督孩子功課，甚至準備晚餐。雙薪家庭父母依賴住在一起或附近的祖父母提供孩童照顧的協助，即便教養理念存在世代的鴻溝。

（三）教養策略與實作之二：規劃自然長大

朝向光譜左端的中產階級父母，期望孩子享有一個免於壓力或強制的快樂童年，並努力塑造一個孩子得以自由選擇與適性發展的空間，我稱這個教養模式為「規劃自然長大」(orchestrating natural growth)。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與 Lareau 所說的「讓孩子自然長大」很接近，但「規劃自然長大」有賴父母的策劃與努力，人工打造一個「自然長大」的空間。換言之，「規劃自然長大」其實是一個矛盾語：孩子的「自然長大」是在父母的精心策劃下得以發生，並非自然狀態。比方說，父母希望尊重小孩的喜好、讓他們自由選擇課外活動，不想把才藝課當作一種強加的培育課程。然而，有些父母其實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才引導孩子走向父母所期望的「選擇」。如下面這位天龍國小的母親，想要女兒像她一樣從小學鋼琴、喜愛音樂，但希望女兒「自然」地開口要求學習：

我想要送她一個禮物，我想讓她有一個她喜歡的興趣，我不會去強迫她。像學鋼琴，不是我叫她去學的，我一直在等她開口跟我說她想要學鋼琴。那我怎麼去達到我這個目的？我從她還很小的時候，每個月，比如說中正紀念堂那裡，可以同時拿到全台北市的表演資料，那我就會幫她安排，就是對她的一個投資，讓她去看一些表演，各式各樣的，只要小孩子可以看的，盡量都去看。然後我覺得在無形中她就會……反正我就是在等她開口，那後來有一次我們去看朗朗。她就是看了朗朗之後，回頭跟我說：「媽咪，我想要學鋼琴」。

讓孩子適性發展與自由選擇，體制學校內的許多中產階級父母也心嚮往之，卻又隱隱擔心競爭力的不足。座落在光譜的左端，則有日益增多的父母透過另類教育的選擇，將「規劃自然長大」落實為具體的教育策略。與「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的主流觀點形成鮮明對照，一位送孩子就讀另類學校的母親說，她擔心主流教育讓「孩子還沒開始跑，就昏倒了」。近年來，另類學校在台灣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快速成長，其中包括私立、公辦民營的實驗學校，也有若干標榜「田園式教學」的小型國小。相較於不少主流學校在少子化的趨勢中面臨招生危機，另類學校因為吸引慕名就讀的移居家庭，反而出現滿額、候補的情形。家長選擇另類學校的動機其實很多重，有些父母基於自身求學經驗的教育創傷（遇到不好的老師或過度的競爭壓力），有些因為孩子個性（如過於好動、上課愛插嘴、注意力不足）無法適應主流教育體制，有些單純希望孩子可以享有快樂的童年（詳見 Lan 2014b）。我們研究的田園國小（宜蘭另類學校）家長中只有少數的當地家庭，多數是從都市遷移而來的中產階級。這些父母擁抱西方模式的另類教育，希望讓孩子跳脫智育至上與課業競爭的窠臼，以享有較為全面的發展與學習。

選擇將孩子送讀另類學校的家長，經常面臨他人的質疑，尤其是都會區以「培育國際競爭力」為教養目標的階級同儕。一位旅居上海的台商太太看到雜誌裡對田園國小的介紹非常嚮往，幾經考察後決定搬到宜蘭讓孩子就讀，上海的台商朋友紛紛勸告她說：「大家都拼命往國外跑了，你怎麼還把孩子送回鄉下去」。家長面對類似質疑時，另類學校所提供的豐富論述資源（書籍、師訓、家長課程），尤其強調以西方教育理念為本，讓家長較有信心回應外界的疑慮。有的家長認為另類教育可以培養孩子的創造力，在技術創新、產業多變的未來可以幫助孩子建立不同的競爭力。也有家長選擇另類學校的主要原因，在於避免主流教育體制對孩子造成的負面影響（如考試過多、老師管教過嚴），為了補強孩子的學習，父母在課餘透過經濟資本的投入來聘請家教或送英文班，或者，依靠家長自己的文化資本來提供輔

助教學。一位在大學擔任講師的母親，面對有人質疑另類學校的學習效果時，很有自信地回應：「沒關係，學校沒有學就自己加強，我們自己是老師，什麼不夠的可以自己教」。

宜蘭當地的家長也對外地人爭相就讀田園國小感到不解，多認為移居都市替孩子爭取更有「競爭力」的教育資源都來不及了，為什麼要「回歸到過去的教育方式」。一位返鄉讓孩子就讀田園國小的父親告訴我，務農的長輩對此安排並不贊同：「為什麼要送孩子去學爬樹？」、「都沒有教讀書寫字」。這位父親在訪談時情緒略為激動地說：「小時候我媽我爸什麼東西都幫我做好，只要我專心讀書，現在長大了我有的時候會覺得很氣，他們懂得很多……種田、種菜，我都不會，我會很氣我爸媽，以前什麼東西都不讓我做。」父母過去的教養目標集中在讓孩子透過教育成就取得社會流動，包括職業與城鄉的流動。這位父親經歷了求學競爭與都市生活，如今珍惜、甚至嚮往家鄉、農間的生活方式。其中涉及的技能與知識並不受到主流價值肯定，難以成為具有象徵地位的文化資本，因而讓父親認為沒有代間傳承的價值，但在另類學校裡，爬樹、種田、木工變成正式的課程內容，受到教育體制的認可。

田園國小對於家長的教養方式有高度的規範與要求，期待透過家長的配合與努力，共同營造一個去商業化、有機的家庭生活。家庭用品，尤其是孩子的衣服與玩具，最好用天然素材製成，如棉麻或木頭；過去買的塑膠玩具、商業遊戲、電腦電視，建議都捨棄或藏起來。學校午餐一律提供有機素食，家庭飲食也偏好在家烹調有機、新鮮食材。有些家長擔心疫苗與西藥對孩子身體的負面影響，團購中藥、另類療法的小藥丸。這些家長小心翼翼地管理家庭生活，打造了一個孩子「自然長大」的溫室空間。矛盾之處在於，父母畢竟不可能將孩子與外界環境隔離開來，孩子回都市探望祖父母或其他親戚時，便會接觸到電視及商業文化。這樣的教養方式產生的非意圖後果是，孩子對隔離開來、不符合另類學校的生活方式元素反而衍生嚮往，或者，他們世故地了解上學時應展演「正確」的穿著、玩具，例如，把

阿姨送的印有迪士尼卡通圖案的球鞋留在家裡，跟表哥交換的遊戲卡只能偷偷在學校廁所裡拿給同學看。

這樣的以小孩為中心的「島內移民」，需要家長生活方式的調整，其實較小孩更甚。家長必須放棄看電視的習慣、節制電子產品的使用（至少在孩子面前），並適應商業娛樂鮮少的鄉間生活。更重要的是，原本雙薪的家庭，母親多辭掉工作專心照顧孩子，父親則通勤到都會區來工作（多數週末團聚，少數每日通勤）。許多母親笑稱自己是「假性單親家庭」，這樣的居住模式強化了養家父職、照顧母職的性別分工。為了追求學校所認同的有機生活模式、降低商品與外包的使用，母職任務變得更為密集與多重。她們必須學習手工藝，來幫助孩子在校的學習活動，例如織毛線娃娃、染教室窗簾、縫孩子在教室穿的室內鞋，以及手製文具袋等。有些母親，尤其是在外工作者，對這些學校的要求倍感壓力。但有更多的母親，尤其是全職育兒者，從這些活動中獲取意義感，得以將照顧孩子從瑣碎的日常事務中提升到「科學母職」或「精神母職」的層次。一位積極在田園國小參加師訓、擔任志工的母親，描述她在宜蘭的生活，相較於過去在台北擔任全職家管，有更多生活的目標：「來這邊以後，我比較有事情做吧，〔研讀〕××博士（另類教育學者）的學說也好，有事情讓我更投入地去做」。此外，她們也從家長網絡中得到社群支持，一位母親比較過去在都市裡當家庭主婦的生活：「以前在台北，你知道我是很孤單，我的情緒沒有地方發洩，而且我沒有那個……社群，沒有援助，一個人關在那裡帶小孩，其實隨時都很情緒化」。在宜蘭的母親，由於理念與生活方式的相近，形成交換資訊、集體育兒、團購另類商品的社會網絡。這樣的社會資本幫助她們學習與自身成長經驗斷裂的教養腳本、流通另類的教養資源與工具，也鞏固了不同於主流教養理念的信仰。

四、勞工階級家庭

（一）親職敘事與教養腳本

相對於中產階級的「世代斷裂」敘事，我們較常聽到勞工階級使用「世代延續」的敘事來形容自身為人父母之道，如小布的爸爸所言：「你爺爺當時怎麼對我，我就按照這種方式來對你」。他們傾向類似自己的父母輩，採取接近華人文化傳統的「管教」或「勤教嚴管」的模式（林文瑛、王震武 1995）。跟小孩溝通時，父母較常使用命令語言或威嚇語氣，處罰辦法較少有孩子議價的空間（有一戶稱之為「家規」），也經常借用制度權威者的角色來確認處罰的嚴重性（「如果你們再講話，老師就會拿膠帶把嘴巴貼起來」、「你不乖我就叫警察來抓你」）。父母的肢體語言也標示出相對於孩子的階序關係：跟小孩說話時，往往是站著、往下看小孩。

我們在河岸國小徵詢家長同意參與研究之際，學校老師很熱心地協助，幫我們跟家長解釋：「他們想要去你家看你和小孩的互動啊。」常常得到的家長反應是：「有什麼好看，就是打啊。」雖然在相當程度上延續「不打不成器」的傳統教養腳本，勞工階級父母也強調親子關係與前一個世代的斷裂；「要跟孩子做朋友」這樣的說法，普遍出現在受訪者口中。當今的父母施行體罰時，會用較不易造成肉體傷害的工具或打法，也會和孩子說明體罰的理由，並在事後展現溫情的撫慰。如我們觀察到小布媽媽在打完孩子後，往往會抱著哭泣中的孩子說：「媽媽是因為愛你才打你，知道嗎？」換言之，權威管教與情感關係不被視為互斥，而是相輔相成的教養做法。相較於祖父母世代，中產階級父母可以說是「斷裂（敘事）中有延續（實作）」，勞工階級父母則是「延續（敘事）中有斷裂（實作）」。

為什麼勞工階級家長仍以體罰為主要的管教手段？既有研究認為因為他們拙於言辭、下意識地延續了過去身受的管教經驗（張建成、陳珊華 2006），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階級位置導致的資源不足，

讓他們難以使用以中產階級為原型的新興教養腳本。我們在田野中經常感受到勞工階級父母「不曉得要怎麼教」的挫折感，他們欠缺教養文化資源，甚至不時詢問年輕未婚的研究助理有關育兒的建議。經濟的困境與時間的緊張也耗費了他們多數的認知資源，很難有耐心對待孩子的吵鬧或有餘裕去學習新的教養觀念，因而偏好立竿見影的措施。¹⁹小布媽媽嘆著氣說：「家庭上的影響，對我們的心理有影響，教育小孩、脾氣方面，有時候多多少少會啊……你工作不穩定的話，會擔心。我現在教小孩，我又想到，我腦袋不會平靜啦，就像電影院演一演，我就擔那麼多角，什麼又到期了，什麼又要繳了，什麼錢要給了」。

其次，勞工階級父母與體制互動過程中，直接或間接感受到階級化的教養汗名，容易強化其嚴格管教的傾向。我們在天龍國小尋求訪問時，大多家長都很樂意參與，甚至充滿自信地假定自己是教養的成功範例，才得到邀請訪問。我們在河岸國小有著完全不同的經驗，許多家長拒絕受訪，或者，聽到訪問邀請的第一個反應是：「我的小孩在學校有什麼問題嗎？」教養失職的焦慮，普遍籠罩著勞工階級父母，因為目前的主導教養腳本，需要家長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時間投入，媒體或學校經常讓無法配合的父母感受到匱乏與不足。

在這樣的脈絡中，體罰可能成為勞工階級展演親職投入的一種方式，以避免被指責教養失職。勞動階級同樣會反身性地看待自己的教養實作，不同於中產階級的是，他們較少透過專家論述的框架，更常透過關鍵他人（老師、其他家長、研究者等）的評價，來評估自己是不是個好父母。小布的成績其實不錯，但在學校因為闖過幾次禍被貼上「壞學生」的標籤，小布媽去學校的時候，感受到其他家長（尤其是中產階級家長）對她冷淡、不打招呼，她於是不想再去班親會，擔

19 行為經濟學家從認知的角度分析貧窮的心理過程：由於認知資源有限，經濟資源的短缺會限制人們的注意力，進而影響其思考與自我控制(Bertrand et al. 2004)。我認為也可以用來解釋貧窮父母教養子女時的心理困境。中產階級父母，則可能因為時間資源的短缺，限制了注意力與自我控制，導致教養時情緒失控。

心受到其他家長指責。小布父母都經常施以體罰，即便研究者在現場，打起孩子也不手軟，訪談中甚至詳盡地描述自己對孩子有多生氣、處罰有多用力。我稍後才明白他們其實是有意或無意地藉此讓我看到他們有在「努力管教孩子」，不論效果如何。

此外，也有受訪者並不贊同中產階級親戚的教養模式，質疑過度強調跟小孩講道理是否能達成管教效果。他們認為體罰仍是必要手段，需要與新式教養方式相互搭配，如一位母親所言：「打小孩和講理要兩個一起啊。就是先打他，邊打邊講，打完之後，再繼續跟他說。像我小姑就只跟小孩說：『這樣不可以。』我覺得這樣沒用，那個態度和口氣，要嚴厲。」除了擔任銷售員的少數，勞工階級的職場較少強調口才訓練，養成的階級稟性與重視說理、溝通的教養腳本距離較遠。他們的職場經驗傳遞給下一代的秉性與價值，比較接近務實、腳踏實地、刻苦耐勞。相對於中產階級父母致力於培養孩子的「興趣」或「創造力」等抽象教養目標，「品行好」、「守規矩」是勞工階級父母更重視的道德基礎。

不少勞工階級父母在訪談中表達「失落童年」的敘事，但內容與中產階級不盡相同。升學導向的台灣教育環境，往往將智育成績不佳的孩子歸為「失敗組」，學校的強迫學習讓他們的成長經驗充滿挫折感。這些父母因而傾向採取「讓孩子自然長大」的策略，希望孩子度過一個「快樂、不痛苦」的童年。如一位母親所言：「其實現在，你說要怎樣培養或是鍛鍊，我覺得我沒有特別去作耶。我頂多可能就是，我只是希望說，在他們這個年齡，他們不要有一個痛苦的童年」。

這些家長視「純真童年」為一種「自然狀態」，父母的責任在於避免外部壓力的強加，並不需要人為建構有別於成人世界的「快樂童年」。²⁰ 不同於中產階級家庭構築童話世界，保護孩子免於過早進入

20 雖然也有少數勞工階級家庭配合幼稚園慶祝耶誕節，讓孩子在家裡掛襪子，假裝耶誕老人送禮物，但進小學後就會停止相關儀式。

「子代激烈競爭」的現實，勞工階級父母的現實感，主要來自「父代的經濟侷限」。有些父母會有意告知或無意中透露家裡的經濟問題或父母的工作困境，從而讓孩子瞭解家庭的經濟資源有限，以及為何無法負擔額外的活動或新玩具。²¹ 這些勞工階級父母透過「現實童年」的觀點，將兒童與成人的生活狀態視為連續的生命階段，希望藉此激勵孩子努力，以透過代間流動來超越父母輩的現實困境。

在我們進行家戶觀察的小布家，專科畢業、從事鐵工的父親，在工地發生意外摔傷背脊後，只能打以日計酬的零工，近年來的經濟不景氣，讓他找工作更加困難。家庭收入主要依賴來自中國大陸、初中畢業的太太；新移民身份讓她深陷勞動市場的最底層，她在社區小工廠當雜工，沒有勞健保、薪資以時薪九十五元計，「比不識字的歐巴桑還低」，小布媽不平地說。家中的兩兄弟對於家庭經濟的拮据也有所認知，弟弟小布有天拿著學校發的課外活動報名單回家時，落寞地自言自語：「家裡沒有錢讓我去」。小布媽談到這方面的經驗：

他們對錢的觀念很有。我們什麼都是錢，怎樣怎樣。他在幼稚園大班的時候，他就跟我說：「媽媽你為什麼騎摩托車，不開轎車來？」我楞了幾分鐘，這麼小，怎麼可以問我這個問題？我就跟他講：「因為媽媽那個時候沒有錢讀書，所以沒有辦法賺很多錢，開轎車。」「那買轎車要很多錢阿？」我說「對阿，很多錢，媽媽買不起啊。那你要努力學習。」他說：「好，那我要努力學習，找到好工作，賺很多錢，然後我就買個轎車給你。那你就不用戴安全帽，就不用淋雨囉」。

勞工階級父母間的養育分工傾向依循傳統的性別角色。當我問父

21 小布父母雖然賦予孩子現實感，例如在孩子面前談起家庭經濟困境、夫妻吵架時沒有隔離孩子，但仍然維持某些界線，如不會讓孩子知道家裡的債務。

親參與那些照顧孩子的工作時，許多人愣了一會兒，回答說：「賺錢養家，就是我的工作啊」。父職角色除了養家，主要是跟孩子玩耍或扮黑臉處罰；孩子的日常照顧、功課檢查、教育安排、親師聯繫，大部份落在母親的肩上。勞工階級父母同樣不是一個同質群體，其教養策略存在內部的光譜差異，以下兩節描述光譜兩端的理念型。

（二）教養策略與實作之一：培育階級流動力

光譜右端的勞工階級家庭，希望透過升學讓孩子達成代間向上流動，我稱之為「培育階級流動力」。小布媽是個明顯例子，她經常對著孩子耳提面命，以藍領工作（骯髒、困難）低於白領工作（乾淨、輕鬆）的價值框架，來說明階級流動的優點與重要。訪談中她這樣陳述：

我做父母的喔，生育小孩，我當然還是希望他們學好，將來就是盡我的能力培養他。我常跟他們講，你看，為什麼爸爸媽媽沒辦法像一些伯伯叔叔他們做那麼好的工作呢？坐在辦公室裡面耶，用自己頭腦去做生意賺錢呢？你看爸爸做工也是很辛苦，回來身體也是很髒阿，我就說，你看，爸爸跟媽媽那麼累，就是小時候沒有好好讀書，所以就沒有辦法找到好的工作。所以你們要好好讀書，以後可以考上好一點的學校。

然而，不像中產階級母親能夠給予孩童學業上的指導，勞工階級母親並沒有足夠的文化資本來協助孩子的課業，因此更為仰賴學校老師扮演教育者的角色，或是將教育工作外包給安親班與補習班。²² 與 Lareau 筆下的美國勞工階級不同之處在於，住在都會與近郊地區的台

22 近十年來的相關量化研究顯示，台灣學生參與補習相當普遍，階層之間的差異並不明顯（劉正 2006，林大森、陳憶芬 2006，黃毅志、陳俊瑋 2008）。

灣勞工階級比較容易透過市場取得輔助孩子學習的制度資源。都會地區的新移民母親，尤其傾向透過外包教育來追求下一代階級流動的夢想。她們憧憬孩子有光明的未來，好讓自己的移民之苦成爲值得的付出。在天龍國小，我們認識了來自湖南的小俊媽媽，她與台灣丈夫離婚後，獨力撫養小俊。湖南的外婆爲了幫忙女兒也遷移來台，當清潔工、賣水果。高職畢業的小俊媽在一家公司當助理，月薪三萬。雖然家庭經濟資本有限，小俊媽堅持要在大安區租屋（頂樓加蓋），因爲聽說市中心的學區比較好，小俊的安親班、作文班、珠算班等費用加起來每月近兩萬。小俊媽說明這樣的外包策略的重要性：

因為我沒有辦法教小孩子的功課，我爲什麼花這麼多錢，就是我沒辦法教他，我們學的跟台北教的完全不一樣，我看得懂但我沒辦法教他，我也沒辦法去寫，因為我們念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所以我一定會花錢去，不管花在那裡，這個錢我一定會花，去教他的功課……他的同學有錢人家實在太多了，他們會覺得說，我們外籍來的，一般不會花在小孩子身上那麼多教育。我今天可以把一些錢存起來、買別的東西，可是我覺得那對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以後長大的事情，能夠比我好，他以後有任何發展，對我有意義太多了。

新移民母親所承受的教養汙名是雙重的，既是階級劣勢，也是族群弱勢。由於對本土教材與語文的掌握有限（大陸配偶指使用繁體中文的能力），小俊媽媽自認是不適任的教育者；大眾媒體、中產階級家長（孩子的「有錢人家同學」）也傾向質疑她們投資小孩教育的意願與能力。新移民母親承自母國的語言能力和文化知識多半被當作負擔（影響孩子口音、落後教養方式），而非值得傳遞給下一代的資產。於是，市場外包成爲重要的教養策略，這意味著她們必須耗費更多時間在外工作賺錢。

雖然與前述中產階級家長同樣追求「競爭力」，也將孩子的學習活動外包給市場，經濟與文化資本受限的家長，主要著眼於國內的教育成就與職業機會，對於孩童的學習表現，傾向以學業成績為單一指標。美國與加拿大的研究都發現，勞工階級母親比中產階級更強調孩童的學業成績(Lareau 2003; Griffith & Smith 2007)；同樣的，台灣勞工階級父母主要朝向智育為主的「單食教養」(univore cultivation) (Shih 2010)。相對於安親班或補習班，他們認為課外活動或才藝班是昂貴且不必要的支出。有課外活動安排的家庭，偏好英文、珠算等與智育學習較相關的課程，缺乏足夠的資訊或知識來評量課外活動的多樣內容。比方說，有天學校發了課外活動傳單要孩子拿回家給父母看，一位母親看到「街舞」不解地說：「學街舞幹嘛？在街上跳舞喔？我不反對啊，老師，那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啊？」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難以瞭解「全人學習」在後教改體制中成為重要的學習目標，他們幾乎沒有人聽過大學推甄的制度，遑論替孩子規劃有利的多元學習活動。²³

小昆家是「培育階級流動力」的另一個例子。小昆爸是一位高職畢業的建築工頭，過去也曾抱持黑手變頭家的夢想，做生意慘敗後賣了祖傳田地還債，之後就一直在建築工地工作，晚歸回家時身上總是沾滿了泥漿與汗水。他談到自己的工作時，略帶驕傲地說：「我什麼都做，我差不多可以蓋一棟房子喔。」但他並不像中產階級父親，樂於將職場技能傳遞給下一代；即便技術工人的工作機會與所得都相當穩定，他並不期待孩子繼承辛苦又危險的建築工作。他這樣描述工地的生活：「吹風日曬，落雨、又冷，風又大，蠻危險的……我看好幾次了，人從鷹架上跌下來，躺在地上，好像西瓜破掉一樣……」。他溫柔地看著在旁邊玩耍的兩個孩子，轉頭跟我說：「我希望他們坐辦公室、電腦打一打。」同樣做建築工的小昆媽，是孩子的主要照顧

23 其中有位母親，雖然拿到我的名片，還是不太了解「教授」、「研究」的意義，後續的訪問中她還是問我論文寫完沒有、可以畢業了嗎。

者。在期中或期末成績公佈之前，她總是緊張地打電話給老師詢問成績，雖不期望孩子名列前茅或一定要念大學，仍希望孩子可以透過教育來取得一定程度的階級流動，特別是不要再「做黑手」。當我問道如果孩子將來想要繼承父業時，她毫不猶豫地回答：「不要！不肯，如果他要做工地，我可以叫他去阿姨的公司當個小弟也好！」

勞工階級母親沒有受到學校體制肯認的文化資本，難以參與孩子的學習活動；然而，她們可能透過跨階級的社會資本，來轉換為孩子的文化技能或教育機會，例如，受過高等教育的親戚可以提供與教育相關的資訊與建議，或協助孩子遷戶口到比較好的學區。小昆媽的妹妹擁有大學學歷、與先生經營公司，由於沒有小孩，對小昆兄弟視如己出。她不僅提供了有關課外學習的建議，也贊助小昆兄弟購買電腦、補習英文，因為這樣，小昆媽甚至想像孩子未來出國留學的可能。

更常見的跨階級社會資本積累，是母親透過和老師建立私人關係，希望藉此確保孩子受到老師足夠的關注，或至少在孩子出問題時，讓母親容易得到老師的意見與協助。²⁴ 在我們觀察期間，有位老師生病住院，學生的母親紛紛在工忙之際到醫院問候探病。親師之間的聊天內容經常包括與小孩學習沒有直接相關的家庭問題，如父母吵架等婚姻間隙，也有母親請老師協助介紹工作。親師關係相對緊密，並沒有像 Lareau (2000) 所描述的美國勞工階級，與學校老師的關係疏離而對立；反而是天龍國小的親師關係呈現潛在的緊張與距離，在教學、處罰孩子等方面，中產階級家長容易與學校老師有意見的分歧。台灣的勞工階級家長，透過建立私人化的親師關係，希望藉此確保外包培育流動力的策略得以成功。

（三）教養策略與實作之二：順其自然造化

在光譜的左端，父母採取「順其自然造化」的態度，期待小孩可以完成基本學歷，將繼續升學視為個人資質的自然發展；如果小孩被

24 有一位單親家庭的父親，也會和老師積極建立關係。

體制認為是可造之才，父母便會支持繼續升學（台語所說的「可以讀就讓他讀」）。家長雖然關切成績，並不期待孩子出類拔萃、名次領先，只要求成績及格或不墊底，也就是達到「基本學習」的目標；孩童多因成績低到全班倒數時，才會受到父母的處罰（陳如涵 2010）。

以住在新北市的貝貝家為例，父母都是高職畢業，爸爸曾任工廠採購，由於學歷限制難以升遷，中間一度經營超商，失敗後開計程車維生。媽媽一面讀夜校，一面打工，生了三個孩子後在家專職照顧。勞工階級家長自身經歷了升學或創業的失敗經驗，不希望對孩子複製「唯有讀書高」的壓力，或強加社會流動的期待。貝貝與姐弟都沒有上安親班，下課回來就在家裡做功課與玩耍。爸爸認為這樣的安排可以讓孩子度過快樂的童年：

我最主要是這樣，不希望說他們一定像人家說，你下課回來，又要去安親班，又要去上課什麼，我不希望給小孩子壓力啦……我對小孩態度是說，讀書是你們自己的，不是我的，我不會去硬逼你們。考試時間到了，你們自己去看書。成績對我來說，我不會很注重啦。但是，我會去看說，你為什麼會考那麼低，以你的程度，應該是中上，至少你會及格。

這些勞工階級家庭生活裡，沒有刻意安排太多以小孩為中心的學習或休閒活動，而是將親子活動「嵌入」家庭生活之中。²⁵ 週末除了待在家看電視、拜訪祖父母，有些父母帶小孩享受低消費的休閒活動，例如去「湯姆龍」遊樂場、到游泳池玩水、逛夜市、大賣場或百貨公司，順便在炎炎夏日享受免費冷氣。父母的養育角色以「陪伴」為主，而非「教育」。祖父母同住或鄰住的比例更高，也分擔一定的

25 肖索未、蔡永芳(2014)研究北京農民工家庭的育兒，反省到研究者多傾向用中產階級中心的「教育」觀點來理解兒童撫養，從而用負面的方式看待勞工家庭「將兒童活動嵌入家庭生活」之中的樣態：父母對家庭成員的需求互相協調，孩子的需求是家庭決策的一部分，但不是絕對的優先。

看顧責任。這樣的家庭生活，組織化程度低，也少了中產階級家庭常見的因為父母要求孩子做功課、練琴而衍生的親子衝突。

許多勞工階級父母都在訪談中說了類似的話：「如果我的孩子不是那塊料，學這學那不是浪費？」勞工階級傾向於「必要性」(necessity)的階級品味(Bourdieu 1984)，將課外活動視為奢侈、非必要；孩子的才能是先天賦予的資質，而不是後天培養的成果。對於經濟資源有限、孩子人數多的家庭來說，課外活動不僅造成財務負擔，學習效果的不確定性也太高。貝貝爸說明家裡沒有辦法，也沒有必要讓孩子學才藝的原因：

有的家庭比較過得去的話，就是讓他們（孩子）有個才藝去學啊，看他們比較有興趣哪一個，你就讓他去朝那個方向（發展）啊。那我沒辦法這樣啊，因為他一學你就是繳學費，他不學，這錢就沒了啊。

「順其自然造化」往往是時間與金錢有限的父母不得不然的教養方式。我們訪問的勞工階級家庭，表面上看來並沒有明顯的經濟困境，但結識久了後，我們發現多數都肩負著數目不等的債務。他們或因為曾經懷抱著階級流動的夢想、借錢創業失敗（均為父親），或因為生活需要週轉，仰賴「塑膠鴉片」來平衡家庭收支的缺口（夏傳位 2008）。小泰家就是個例子，專科畢業的小泰爸在工廠當作業員，在工作時結識從泰國來打工的前妻，婚姻關係在小泰生下不久後出現裂痕，目前已離婚分居。小泰由父親和阿嬤撫養長大，兩人各自有十幾、二十萬的卡債。六十多歲、不識字、在餐廳洗碗的阿嬤解釋，當時受到辦卡趨勢影響，但欠錢也是生活所迫：「那時候人家都在辦啊！沒刷卡就沒法生活啊，轉不過來啊，卡債〔現在〕也是都卡住了啊！」阿嬤與爸爸的工時都相當長，小泰放學後經常單獨在家，當我們問到為何讓小泰在家而不送去安親班時，阿嬤這樣回答：「爸爸小時候去讀（補習班），不喜歡讀書啊。他爸爸就覺得很痛苦，就不要

他兒子這樣子。」身為新移民的小泰媽媽，在離婚時有向爸爸提出讓小泰上安親班的要求，爸爸也同意了。媽媽在訪談時指出經濟侷限仍是重要的阻力：「他爸爸就說要等一下等一下，因為他爸爸可能也沒有什麼錢」。

對身處次級勞動力市場的父母來說，相對密集的勞動條件，侷限了他們與小孩共處的時間。沒有祖父母可以協助的雙薪或是單親家庭，兒童照顧更形困難。以小泰家來說，擔任工廠作業員的爸爸經常在晚間及週末加班，以配合國際買家的緊急訂單。在餐廳工作的阿嬤一週工作六天，而且多在晚上和週末，只有下午可以回來看一下孫子。小泰因此常常獨自待在家裡，即便這種情況違反「兒童保護法」，但對一些家庭卻難以避免。國家立法與學校制度，往往預設了孩子家中有一位專職照顧者，或是父母從事朝九晚五的工作，罔顧單親家庭的處境或是服務業的工作時程。小泰有天拿了學校老師發的暑假作業回家，其中的活動多要求家長協助共同完成，包括「烤肉」（詢問長輩烤肉經驗）、「只要蛋白質不要肉」（和家人做一道菜）、「家事大作戰」（和家人完成清潔）、「菅芒花女孩」（和父母一起完成大約十二件事情）。小泰看著作業單，苦咬咬地說：「誰有時間幫我做？」

在都會區的勞工家庭裡，如果小孩人數有限，又缺乏大人互動陪伴，孩子經常仰賴「電視保姆」與「電腦玩伴」來打發時間（陳如涵 2010）。獨生子小泰一個人在家時，阿嬤再三交代不可以跑出去玩，他如果不是看電視，就只能跟幻想的友伴遊戲。都市父母多認為「外面」充斥交通意外、兒童拐騙等危險，中產階級小孩還可以在社區保全看顧下的庭園裡嬉戲，住在公寓裡的勞工階級孩子大多只能在室內活動。在他們的身上，我們最明顯地感受到 Lareau 所說的「侷限感」，包括金錢、空間、身體的侷限感。天龍國小的孩子跟成人互動明顯比較自在，有的孩子第一次見面就會問我：「你是誰？」、「教授是做什麼的？」。相對的，河岸國小的孩子會避開跟非親人的成人眼神接觸，在初次見面時也鮮少主動跟我或研究助理主動攀談。

在家庭生活空間上，都會與非都會區的勞工階級有明顯差異。海濱國小位於小漁村，由於青壯人口外流嚴重，生員人數有限（每年級僅一班，二年級全班八人），家庭型態多為非典型，包括單親家庭（離婚後父親返鄉，祖母為主要照顧者）、跨國婚姻家庭，以及隔代教養（父母在城市工作）。相對於城市近郊，漁村的教養文化資源更為稀少，父母要採行外包教育的策略需要耗費更多交通或金錢的成本。當地沒有任何才藝班或安親班，僅有學校提供的以低收入子女為主的「星光班」，免費提供課後照顧與協助完成功課。社區裡有很少數家庭，為了提高「競爭力」，將孩子送到有一段距離的城鎮就讀規模較大的國小。這些孩子也在課後參加城鎮的安親班，課後再由交通車送回，所費不貲。這些「外包培育流動力」的少數個案，父母多在台北工作。

海濱國小的孩子多數沒有參加組織性課外活動。擔任主要照顧者的祖父母，除了日常照顧與看管作息，很少會跟孩子一起玩耍或刻意安排親子互動。新移民母親往往需要從事勞務工作（切魚飼料、捕海藻、處理櫻花蝦、小吃店打工）以撐持家計，因為漁村裡的男性受到外籍漁工引進的影響，工作機會大減。小珍爸爸在國中畢業後嚮往都市生活，到臺北當學徒、成為銀樓師傅，老闆歇業後，他返鄉擔任漁工，近四十歲時到越南娶了小他二十歲的老婆。雖然家裡牆上掛著「模範漁民」的獎牌，小珍爸只能打零工，「有時候好幾個月沒賺到錢的也有」。他並不懷念都市生活，認為壓力太大，雖然工作機會多，花費也大（「一出門坐車就要花錢」），他希望小珍和弟弟在宜蘭鄉下「順其自然長大」：

因為台北那邊就是要補習什麼嘛，功課壓力太大了，在這邊比較快樂，比較有空間給他跑。我是順其自然啊，你強迫他，他不喜歡唸書，你強迫也強迫不了啊。我有看過那個小孩父母一直勉強，到後來壓力太大反而變成像書呆子什麼都不會，因為他每天讀書每天補習……不要強迫他，他腦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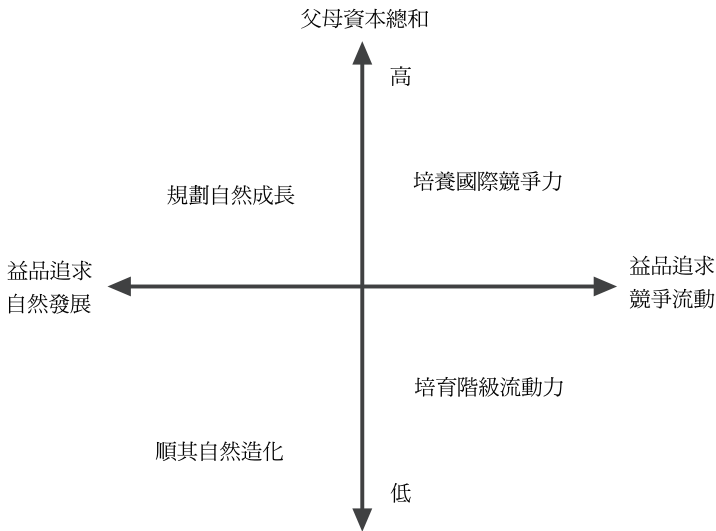
那邊、開竅了，他自然就會了。

村裡的孩子經常在沒有大人陪伴的狀況下單獨在家，但鄰居間密切往來、聲息相聞，白天大門不會上鎖，沒有太多「危險外面」與「安全裡面」的區隔。相對於河岸國小的都市小孩，非都會區的孩子對於每天的活動與遊戲有較高的自主權，他們可以自由地到戶外跟兄弟姊妹或鄰居同伴嬉戲，雖然家裡很少商業玩具，他們會充滿創意、隨興地把手邊可及的東西變成玩具。雖然沒有大人指導、沒有外包學習，他們展現了令我印象深刻的創造力與獨立自主。弔詭的是，這樣的童年生活，其實恰好是田園國小的遷鄉中產階級家庭所嚮往與追求的。只是，後者需要透過父母的努力才能刻意營造出類似的「自然長大」的環境，並且透過另類學校、西方教育理念的背書，來賦予這樣的教養方式一定的象徵資本。海濱國小的家長並沒有足夠的論述能力或資源來認可他們簡樸、隨意的家庭生活方式，祖父母也不認為鄉間的生活技能（如捕魚、種菜、醃製、手工藝）是值得傳遞給孩子的文化資本。有些家長在訪談中流露對偏鄉學校缺乏「競爭力」的隱憂，反而欽羨城市裡的教育資源可能提供孩子更好的發展。

五、結論

本文比較台灣的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在親職敘事與教養實作上的差異，階級位置相近的父母傾向共享類似的教養腳本（理想的育兒之道），雖然腳本往往與實作之間有落差與斷裂。為了避免將階級視為二元範疇或同質群體，我援用 Bourdieu 有關「場域」或社會空間的概念，來分析做父母、同時也在做階級的劃界過程。我建構出一個「親職場域」，以父母的資本組成總量高低（含經濟、文化、社會與象徵資本）、追求益品傾向（偏重競爭流動或自然發展），作為結構這個社會空間的兩條軸線，如圖一所示：

橫軸代表教養實作中首重的益品，多數家庭傾向以孩子的「競爭



圖一 階級化的親職場域

流動」為目標，以確保孩子未來的生存機會、教育成就與職業保障。第一象限的中產階級與第四象限的勞工階級，由於資本配置與總量的差異，雖同樣透過市場外包來強化孩子的栽培，方式卻不盡相同。「培育階級流動力」的勞工階級父母缺乏足夠的（被體制認可的）文化資本來參與孩子學習，只能竭盡父母有限的經濟資本，或試圖建立跨階級的社會資本，來轉換為下一代的流動機會。由於對改革中的教育體制或是跨國的教育機會了解不多，他們更加依賴學校體制的介入。中產階級父母具備相對充分的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得以利用跨國輸入的文化資源，甚至是跨國流動的教育策略，在子女身上「培養國際競爭力」。這些教養資源所培養出的階級慣習，對其下一代進入跨國佈局的金融與服務產業勞動市場具有相對優勢。中產階級區辨秀異的方式在於，他們在教養上追求多元發展，而不只是獨尊智育，期望或想像子女的未來目標是國際競爭，而不只是國內流動。「全人教育」、「國際化」等學習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主流教育體制所認可（雖然未必落實），成為具有象徵支配效果的教養論述。

益品橫軸的左端，首重追求孩子的「自然成長」，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節奏來學習、依循個人的性向來發展，不以考試成績或學歷文憑為絕對目標。「適性發展」、「放手，孩子會學到更多」等口號在當今也成為主導教養論述，然而，教育改革的實質效果有限，明星學校與文憑主義的地位仍不減，在這樣的環境裡，中產階級家長雖嚮往「自然成長」的理念，也不免擔心孩子未來的競爭機會，因此多在橫軸兩端的益品間游移、拔河。「規劃自然成長」的典型，是透過「島內移民」來追求西方教育模式的另類學校家長。他們的教養方式不全然符應階級再生產的邏輯，也就是父母不以再製孩子的競爭優勢為首要目標。然而，能夠忽視階級同儕的質疑，全心規劃自然成長，也植基於父母一定的階級優勢：父母通常有相當的文化資本，可以對自己的教養理念俱備信心，也有能力提供另類學校外的輔助教學。或者，父母有足夠的經濟資本，可以在孩子遭遇體制內升學困境時提供出路，或有家族生意可以讓孩子接班，或可安排出國唸書作為另類升學管道。

第二象限的中產階級與第三象限的勞工階級，表面上看來同樣追求孩子的「自然成長」，但方式與邏輯大不相同。遷居鄉間的中產階級父母，透過人為努力刻意營造出「自然長大」的環境，貌似「放手」的教養其實需要成人生活的大幅調整，尤其是母親以小孩為中心的有機生活細部管理。再者，他們可以透過西方教育理念的背書，來賦予這樣的教養方式一定的象徵資本。「順其自然造化」的勞工階級父母並沒有類似的象徵資本來認可他們的家庭生活方式，父母可以傳遞給孩子的文化資本也不受到體制所認可，他們的親職實作甚至可能被貼上「教養無力」的污名。

上述的親職場域分析呈現出物質位置與理念價值如何交織地形塑社會行動：結構位置並非決定了行動傾向，而是透過理念的反思性中介；然而，理念價值的傾向，也並非存在於權力的真空，資本條件越充分的行動者，越能動員、轉化象徵資本來建立實作的正當性。父母們看似相同的教養實作（如教育外包、讓孩子自然長大），背後可能

有相當不同的行為動機與行動意義；而類似的價值或益品的追求，卻可能因行動者的資本條件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實作樣貌。教養行為也映現多層次的社會實在(Giddens 1984)：個別家庭的教養與個別孩子之間的競爭，背後有著當事人未必認知到的結構條件(unacknowledged conditions)，尤其是階級差異與不平等；父母的教養方式可能衍生非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例如，中產階級父母的規劃栽培可能造成孩子的痛苦學習，甚至創造力與自主性的削弱；勞工階級父母對孩子「守規矩」的強調，可能導致未來在高等教育與專業白領勞動市場上的劣勢。

雖然本研究並未包含長期追蹤的資料，無法探究父母教養方式對於子女未來社會流動機會的影響，但研究成果呈現了家庭教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子女的階級慣習養成，以及中產階級教養模式與當前教改論述的親近性，可能間接限制了勞工階級的流動機會。例如，入學管道的多元化，尤其是推甄申請大學，傾向認可規劃培養下的中產階級慣習與文化資本；入學方式與選填志願的複雜化，提高了家長瞭解制度與協助孩子的門檻，這些都對弱勢家庭子女相對不利。我們應在教育制度與入學方式的改革上，考量到階級的差異與作用；學校教育應避免以中產階級雙親家庭、全職母親為原型來設計學習活動或要求家長參與，否則容易排除、邊緣化其他型態的家庭，強化社會指責的階級烙印，再製了下一代的階級弱勢與社會不平等。

誌謝：本文為藍佩嘉所主持的國科會三年期研究計畫成果(NSC99-2410-H002-170-MY3, 2010-2013)，我要感謝陳如涵、江河清、張慧慈在田野工作上的協力、受訪家長與老師的慷慨熱心，以及謝國雄、吳嘉苓、江斐琪、葉馥瑤、蘇致亨、余耕任的協助與意見。本文曾在中央研究院社會所、中山大學社會系、京都大學社會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所演講發表，我也受惠於與會者的意見。此外，感謝兩位匿名評審與編委會的修改建議，與謝麗玲的編輯校對。

參考文獻

-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 肖索未、蔡永芳(2014)兒童撫養與進城務工農民的社會文化調試。開放時代 4: 183-193。
- 李秀如、王德睦(2007)係貧窮的原罪?或城鄉差距?——談影響兒童英語學習機會的因素。教育與社會研究 12:113-135。
- 李鴻章、杜宜展(2009)臺灣學前幼兒的才藝學習現況調查。幼兒教育 296: 37-49。
- 邱淑宜、林思宇(2006)台灣小孩養到大學,花 500 萬。聯合晚報,2月17日。
- 吳齊殷、高美英(1995)嚴酷教養方式之代間傳承。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主編,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冊,頁 215-247。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林大森、陳憶芬(2006)臺灣高中生參加補習之效益分析。教育研究集刊 52(4): 35-70。
- 林文瑛、王震武(1995a)中國父母的教養觀:嚴教觀或打罵觀?。本土心理學研究 3:2-92。
- 林碧芳(2009)從文化資本探討才藝學習對學習成就的影響。教育與社會研究 17: 111-134。
- 夏傳位(2008)塑膠鴉片——雙卡風暴刷出台灣負債危機。台北:行人。
- 范綱華(2012)父母教育期望對青少年憂鬱症狀的影響:情感支持和負面互動關係的中介機制。2012年第五屆「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
- 教育部統計處,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3973&Page=20272&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 陳雅玲(2007)教育投資,四個聰明策略。商業週刊 1030。
- 許嘉猷、黃毅志(2002)跨越階級界限?:兼論「黑手變頭家」的實證研究結果及與歐美社會之一些比較。臺灣社會學刊 27: 1-59。
- 張建成、陳珊華(2006)生涯管教與行為管教的階級差異:兼論家庭與學校文化的連續性。教育研究集刊 52(1): 129-161。
- 陳如涵(2010)臺灣勞工階級的孩童照顧安排與養育風格。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雅琪(2014)黃金履歷軍備競賽,從3歲開始集點。商周特刊 73:大學甄試必勝上榜術特刊。

- 黃毅志、陳俊瑋(2008)學科補習、成績表現與升學結果——以學測成績與上公立大學為例。教育研究集刊 54(1): 117-149。
- 楊巧玲、徐韶均(2010)當父母，做性別：兼論階級與族群的作用。2010年台灣社會學年會暨研討會論文。台北：台灣社會學會。
- 熊秉真(2000)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台北：麥田出版社。
- 劉正(2006)補習在臺灣的變遷、效能與階層化。教育研究集刊 52(4):1-33。
- 蘇國賢(2008)台灣的所得分配與社會流動之長期趨勢。見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頁 187-216。台北：群學。
- Archer, Margaret S. (2007) *Making Our Way Through the World: Human Reflexivity and Social Mobil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rtrand, Marianne, 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 (2004) A Behavioral-Economic View of Pov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2): 419-423.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and Passeron Jean-Claude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iffith, Alison I., and Dorothy E. Smith (2007)，呂明綦、林津如、唐文慧譯，母職任務與學校教育的拔河。台北：高等教育。
- Hays, Sharon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Irwin, Sarah, and Sharon Elley (2011) Concerted Cultivation? Parenting Values, Education and Class Diversity. *Sociology* 45(3): 480-495.
- Kohn, Melvin (1963) Social Clas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8(4): 471-480.
- Lamont, Michèle (2000) *The Dignity of Working Men: Morality and the Boundaries of Race, Class, and Immigr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n, Pei-Chia (2014a)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Glocal Entanglement: The Contested Transformation of Parenting Discourses in Post-war Taiwan. *Current Sociology*, 62 (4): 531-549.
- (2014b) How to Raise a Global Child: Reflexivity, Change and Divergence of Middle-Class Parenthood in Taiw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eeting, San Francisco, USA, August 15-19.

- Lareau, Annette (2000) *Home Advantage: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2003)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vey Friedman, Hilary (2013) *Playing to Win: Raising Children in a Competitive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eay, Diane (1998) *Class Work: Mothers' Involvement in their Children's Primary Schooling*.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 Sayer, Andrew (2008), 陳妙芬、萬毓澤譯，階級的道德意義。台北：巨流。
- Shih, Yiping (2010) *Raising an International Child: Parenting, Class and Social Boundaries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Shih, Yi-Ping, and Chin-Chun Yi (2013) The Great Un-equalizer? Family and After School Activitie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Demographic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Global Families,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RC06(CFR) Seminar*.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Skeggs, Beverley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 Gender: Becoming Respectabl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tearns, Peter N. (2003) *Anxious Parents: A History Of Modern Childrearing In Americ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Weininger, Elliot B., and Annette Lareau (2009) Paradoxical Pathways: An Ethnographic Extension of Kohn's Findings on Class and Childrear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3): 680-695.
- West, Candace, and Don H. Zimmerman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 Society* 1(2): 125-151.
- West, Candace, and Sarah Fenstermaker (1995) Doing Difference. *Gender & Society* 9 (1):8-37.
- Yi, Chin-Chun, Chyi-In Wu, Ying-Hwa Chang, and Ming-Yi Chang (2009).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aiwanese Youth: School versus Family Context from Early to Late Adolesce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4(3): 397-429.
- Zelizer, Viviana A. (1985)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New York: Basic Books.